

怎探古人何所思

——精神文化考古理论与实践探索

何 弩 著

科 学 出 版 社

北 京

内 容 简 介

这是一部利用中国考古资料,从研究实践出发,构建精神文化考古理论的系统专著。本书对中外精神文化考古研究既有成果和理论建设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梳理与分析,提出了具有内在逻辑的精神文化考古理论框架,利用作者自己的研究个案,展示出精神文化考古理论的实际应用。

本书适合于文物考古、历史、人类学、思想史等方面的专家学者及相关专业的师生参考、阅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怎探古人何所思:精神文化考古理论与实践探索 / 何弩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5. 6

ISBN 978-7-03-044943-6

I. ①怎… II. ①何… III. ①中华文化—研究 IV. ①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28942号

责任编辑:雷 英 / 责任校对:张凤琴

责任印制:肖 兴 / 封面设计:何司阳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5年6月第 一 版 开本:787×1092 1/16

2015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34 1/4 插页:1

字数:812 000

定价:185.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何 弩

本名何努，北京人，1963年出生。1981年7月毕业于北京市海淀区花园村中学。1981年9月考入北京大学考古系，分别于1985、1988、2001年获得北京大学历史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1988～1999年，在湖北省荆州博物馆考古部工作。2001年至今，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现任研究员，山西队队长。主要从事山西襄汾陶寺遗址考古发掘与研究，主持国家科技支撑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陶寺遗址专项”和“公元前3500年至前1500年黄河、长江及西辽河流域精神文化的发展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之“陶寺课题”。研究领域涉及中国早期国家、中国文明起源考古、精神文化考古理论研究等。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考古学文化因素分析法与文化因素传播模式论》、《可持续发展定乾坤——石家河酋邦衰落与中原崛起的根本原因之对比分析》、《陶寺文化谱系研究综论》、《陶寺中期观象台实地模拟观测资料初步分析》、《从陶寺遗址考古收获看中国早期国家特征》、《都城考古的理论与实践》、《陶寺圭尺“中”与“中国”概念由来新探》、《关于艺术考古理论的再思考》等论文百余篇。

本课题为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

中华文明探源及相关文物保护技术研究

“公元前3500年至前1500年黄河、长江及西辽
河流域精神文化的发展研究”（2010BAK67B06）

“中华文明形成和早期发展的整体性研究”

（2013BAK08B09）

序

读者一看这部书的书名就知道，这是一部专门探讨精神文化考古理论与方法的专著。“精神文化考古”一词，在现在的中国考古学界已不是什么新鲜的名词，但退回到三四十年前，要问什么是精神文化考古，不仅考古圈外的人很少知道，就是专门搞考古的专业人士恐怕也很难说得清楚。这一方面是因为有关精神领域考古的遗存发现不多，但另一方面可能也与当时片面强调唯物主义指导思想、片面理解考古学文化是指“特定时间、特定地域内一群遗迹、遗物的总和”的定义有关。随着改革开放国策的推行和基本建设考古的大规模开展，国外的考古学理论包括精神领域考古理论不断被介绍到国内，与精神领域考古有关的遗迹遗物的发现也越来越多，遂促使我们中国考古学者解放思想，摒弃固有的思维模式，寻找新的理论武器，去迎接新的挑战，解析新发现的包括精神领域遗存的秘密，做出新的符合客观实际的论断。

精神是相对于物质而言的。何弩在本书中给出的精神文化考古的定义是：“考古探索人类社会认知能力的主流成果所形成的文化内涵，即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式。”“社会意识形式以自然观、社会观、宗教观为核心，以符号与文字、艺术为两大表达体系。”本书除前言和后记共分八章：

第一章是“精神文化考古研究史回顾”，下分“国外精神文化考古研究现状”、“国内外有关中国古代精神文化考古研究现状”和“小结”三节。看了这一章三节，国外和国内有关精神文化考古研究的发展脉络、成就、问题和方向便一目了然，因为何弩不仅以时间为序忠实地罗列了基本事实，还对不同时期有代表性的研究者的成果有深入的分析和中肯的评论。

第二章是“精神文化考古的理论概念”，下分两节。第一节交代了认知及认知考古、精神文化、精神文明等精神领域的诸多定义；第二节则提出了自己的精神文化考古理论总体框架和精神文化考古的准确定义。

第三章是“社会心理基础考古研究”，亦分两节分别阐述了他提出的社会心理基础考古理论的概念和在此方面可研究的重要课题试举。

第四章是“自然观考古的理论与实践”，下分两节。第一节，介绍了包括宇宙观考古和古代科学的考古在内的理论概念。第二节是陶寺文化的自然观考古实践，该节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通过对陶寺发现的“观象台”遗迹、漆绘“圭尺”、铜铃与带

齿铜环、夯土建筑技术、白灰、陶板瓦、蓝色建筑装饰材料及朱砂等的分析,探讨其所反映的陶寺文化科学技术状况及水平;第二部分是通过对陶寺“观象台”遗迹、漆绘“圭尺”、陶寺城址总体规划布局等的分析,探讨其反映的太极阴阳两仪概念、盖天说理念、宇宙观模式、“地中”宇宙空间概念、政治地理五方概念以及璇玑反映的月相变化阶段划分概念等。

第五章是“社会观考古理论与实践”。和第四章一样也分两节,第一节是对社会观考古的理论与方法的阐释。第二节是陶寺文化社会观考古实践,包括陶寺文化文德统治观念、陶寺文化的“地中”观念与王都居地中、陶寺文化玉石圭所体现的官僚委任凭信观念的由来、陶寺文化晚期的政治报复观念和等级观念等内容。

第六章是“宗教观考古理论与方法”,下分三节。第一节是包括宗教信仰体系的考古和宗教权力分配观念考古在内的宗教观考古的理论概念的阐释。第二节是包括罗家柏岭祭祀中心遗址和肖家屋脊文化玉石礼器与宗教信仰在内的肖家屋脊文化宗教信仰的个案研究。第三节是包括陶寺遗址出土的宗教用器所反映的宗教信仰、1FJT3主殿宗庙功能蠡测、陶寺文化宗教崇拜的特点在内的陶寺文化宗教信仰个案研究。

第七章是“符号系统考古理论与方法”,下分两节。第一节是包括符号与文字基本理论的梳理和符号系统考古定义、内容理论分述在内的符号考古理论概念的阐释。第二节是包括石家河文化陶符神徽象征意义蠡测、陶符神徽的等级制度、陶符神徽的性质、标记符号简述在内的石家河文化刻画符号研究。

第八章是“艺术考古理论与方法”,下分六节。第一节是艺术考古能否成为精神文化考古独立的领域分析,第二节是美术考古与艺术考古理论概念的分析,第三节是艺术的本质,第四节是包括黑格尔艺术类型分析和艺术类型学新分类在内的以考古为视角的艺术分类问题,第五节是艺术考古内涵与定义,第六节是石家河文化彩陶纺轮太极图艺术分析示例。

我之所以详细罗列本书的章节篇目,是想说明无论从书名还是内容,都可看出这的确是一部全面系统阐释精神文化考古理论方法并有丰富典型实践运用例证的著作。

这部书稿我断断续续用了一个半月才读完,有的章节更是反复阅读、反复琢磨。书中的有些观点在过去何弩发表过的文章中曾有所披露,但如此完整系统地将自己的观点和盘托出,这还是第一次。何弩计划写这么一部书的想法我是知道的,但拿到书稿之前我还有些担心,他会不会把西方考古学界流行的有关精神领域考古的理论方法编缀一下完事。但当我认真阅读并研究过书稿之后,我所有的担心都彻底打消了。只有这时我才敢说:这部书不仅是一部系统的有关精神文化考古的专著,而且是一部在对西方有关考古学理论方法分析研究、合理弃取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考古实践总结提升、补充、改造、完善形成的、盖有明确何弩印记的充满创新色彩的考古学理论著作。

在这部书中，何弩很重视对国外考古学理论方法的吸收，列维-布留尔、列维-斯特劳斯、马林诺夫斯基、J. G. 弗雷泽、格罗塞、B. A. 伊斯特林、弗洛伊德、黑格尔、亚里士多德、张光直、格林·伦福儒、福兰纳利、大和岩雄、米海里司、班大维、艾兰、王爱和、普特、崔格尔、罗兰·巴特尔、凯文·林奇、宇野隆夫、拉尔夫·伊利斯、林巴奈夫、吉田贞吾、E. H. 贡布里希、罗伯特·莱顿、哈里·卡纳、杰西卡·罗森等著名学者的著作，都对他的理论体系的形成和构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他不是一味模仿、生搬硬套，而是一一经过分析，他认为正确的予以吸收，不足的予以补充完善，有问题的予以改造，错误的予以指明不用。大家知道，英国的格林·伦福儒是国际考古学界公认的著名学者，他和巴恩合著的《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前些年译为中文在国内出版，深受好评。其中用了第10章一章的篇幅介绍了与何弩所倡导的精神文化考古概念密切相关的“认知考古”。何弩虽然肯定了伦福儒关于认知考古理论与方法的概括，“有个案分析实例，也有规律性的指标，深入浅出地介绍了探索古人认知构图的具体方法论”，“注重理论与西方考古实践相结合，实用性比较强”。但又认为“整个理论体系缺乏一个完整的和逻辑的框架”，“缺乏一个有效的哲学层面的系统支撑”，“缺乏系统性”。对于在认知考古学上同样有重要建树的福兰纳利，何弩虽然承认他的理论方法体系“比伦福儒更加系统得多”，但又认为“对于认知考古的方法，福兰纳利并没有十分明确的阐释”。对其他学者，包括日本的大和岩雄、著名美籍华人学者张光直等，他都有这样的分析。何弩正是在对这些国际一流学者研究成果批判吸收的基础上，通过自己的研究，在对“精神领域”、“精神文化”、“精神文明”、“认知”等一一进行科学界定之后，提出了自己的精神文化考古理论总体框架。按照何弩的表述，这个框架包括一个基础，即社会心理；三个核心观，即自然观、社会观、宗教观；两个表达体系，即符号体系和艺术体系。该书图六“精神文化考古研究理论结构图示”，即是对此框架的最直观、最简洁的表达。第三章至第八章则是从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角度分别对此框架的六大内涵所作的说明和阐释。

关于社会心理基础考古研究，国内外都鲜见成功的范例，何弩认为“必须在方法论上有所创新，那就是以比较成熟的社会心理理论范式，指导从考古资料中萃取古代社会的社会心理，其中主要包括普遍的社会动机、社会态度、社会价值取向、民族心理特征等”。就中国而言，他认为可以开展古代大型公共建筑、大型水利工程兴建等“统一意志”意识形态形成的社会心理基础研究，社会进入分层和早期国家出现以后等级制度形成的集权独断意识和对权威绝对服从的社会心理基础研究。在这方面，何弩虽提出了问题，但自己并未有具体的实践。

关于自然观考古，何弩认为包含宇宙观考古和古代科学考古研究两个方面。所谓宇宙观，“是关乎天、地、人三者关系在时空框架内发展变化的认知与理论解说”，“宇宙观中关于天的观念认识构成‘天道论’，关于人本身的观念认识构成‘人生

论’，有关地的观念认识构成‘地器论’”。“天道论、人生论、地器论往往又可以综合起来，构成阴阳太极、阴阳八卦、阴阳五行、天人感应、天地形成、大地肌体等观念，实际上也是自然观中本源论、空间论和时间论的综合”。因此，宇宙观考古研究的方法，是“对相关的遗迹和遗物进行宇宙观角度的探索。古代文献包括传世文献和地下出土文献对于探索古代的宇宙观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和引导价值”。该书图七b是一张宇宙观解构图，看了这张图，何弩对宇宙观的理解和认识便可一目了然。在这一理念指引下，何弩对河南濮阳西水坡有蚌堆龙虎图案的M45、湖北天门石家河罗家柏岭遗址红烧土建筑、新石器时代流行的瓮棺葬习俗等做出了自己的解释。“古人结合各种经验性知识，从自然观客观的半边中凝结出的系统知识体系就是古代的科学”，何弩根据夏鼐先生的相关分类，列出的有“中国古代天文学（包括历法）、数学（包括度量衡）、地学、物理（水利与交通知识）、农业知识、生命科学知识（医药）、化学（陶瓷与冶金）、建筑学等”。而古代的科学的考古方法则仍然要“立足于考古发掘的遗物遗迹，结合相关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原理，进行多学科综合研究，依靠地下出土文献，参考必要的传世文献”。

在自然观考古方面，何弩对以山西襄汾陶寺遗址为代表的陶寺文化的发现与研究费时最长、用力最多、影响也最大。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编号为ⅡFJT1的观象台址和ⅡM22：43漆杆圭尺遗存的发掘和解读。

ⅡFJT1观象台址位于陶寺中期大城附设的小城内，是依托小城内侧城墙建造的一座3层半圆形基址，第3层也就是最上一层台基上，有一道弧形夯土墙基础，人为挖出10道浅槽缝，形成11个夯土柱基础。因“迎日门”错位原因，还有两个夯土柱基础设置到了第2层台基上，于是便形成了一个包含13个夯土柱和12个观测缝的完整的特殊建筑。2003年，当何弩揭露出这一形制特殊的遗迹时，琢磨会否与观象制定历法有关，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由于过去考古从未发现这类形制结构的建筑，多数人持慎重态度，持怀疑态度的也不少，也有讽刺挖苦甚至于毫无根据诬为“造假”的。在2003~2005年发掘期间，我曾两次前去参观。第一次去时夯土柱和观测缝基本露出，尽管我内心倾向认为可能与观测太阳运行有关，但未在何弩面前“表态”，我只是告诉他“只要是按田野考古操作规程挖的，挖出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不怕别人说三道四。至于干什么用的，可以有各种解释，没有想法的考古工作者不可能成为真正的考古学家”。我还问他“搞天文考古的人怎么看”？他告诉我“他们说没有固定的观测点就很难定下来”。第二次再去参观时，果然在根据第3层台基上弧形夯土墙基的弧度推定的圆形中心部位，发掘出了由大小四个圆圈组成的固定观测点。从2003年到2005年，他们站在观测点上，透过观测缝远望对面高低起伏的塔儿山山峦，对太阳的日出视运动运行进行了72次观测，得到了重要的判定节令的模拟观测数据，为恢复4000多年前黄河中游地区的历法奠定了科学的基础。只是在这时，常常默默无语面

笑容的何弩才露出了灿然的微笑，压在我心上的一块石头也才落了地。何弩写有一篇《陶寺中期小城内大型建筑ⅡFJT1发掘心路历程杂谈》^①的文章，真实而又生动地记录了这期间他的思想情绪的变化。

ⅡM22：43漆杆圭尺和ⅡFJT1观象台址一样，也是中国考古学史的第一次发现，如果何弩他们没有过硬的田野考古技能和严肃认真的态度，头脑中根本没有这样的观念，恐怕就很难发现，即使清理出来了，也难以做出合理的解释。

除此之外，何弩还对陶寺考古发掘出土的铜器、夯土、板瓦、朱砂、颜料等一一做了科技检测，对当时的科技水平得出了符合实际的认识。

至于陶寺文化自然观的宇宙观，何弩通过分析ⅡFJT1观象台址第3层半圆形台基生土台基芯和花夯土台基芯构成的太极图形，探讨了陶寺人的太极两仪观念、盖天说观念，通过对陶寺城址总体区划布局探讨了其反映的宇宙观模式，通过对陶寺圭表分析探讨了其反映的“地中”宇宙空间概念及扩展出的陶寺文化政治地理五方观念，通过对牙璧的分析探讨了6点6段月亮运行规律的朔望月阴历。我认为其中基于太极两仪观念、盖天说观念、方位观念和陶寺城址功能布局的实际情况提出的城址区划布局反映的宇宙观模式，只要根据具体情况灵活运用，对于研究历史上的城市规划布局有普遍的启发指导意义。

关于社会观考古，何弩基于他对“社会观即是人们对社会组织的认知和理论解释所形成的观念，包括社会治理理念和伦理道德两大部分”的认识，提出“社会观研究方法是以前遗物遗迹考古研究为基础，将相关考古资料回归到考古存在背景关系中去，结合政治学、出土文献、历史文献、民族志资料参考、行为心理学等的综合研究方法”。在此理念指导下，他对陶寺文化反映出的文德统治观念、“地中”观念与王者居地中、玉石圭所体现的官僚委任凭信观念的由来、陶寺晚期的政治报复观念等作了探讨，我认为其中对“地中”观念与王者居地中和政治报复两问题的分析最深刻，也最有说服力。

我国先秦文献多有“测日影以定地中”（即以夏至影长确定地中）的记载，《周礼·大司徒》即云：“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影），以求地中。……日至之景[影]，尺有五寸，谓之地中，……乃建王国焉。”过去只知道周公在洛阳测日影定成周的故事，何尊“宅兹中国”铭文发现以后，才知道西周早期“中国”一词的出现确与“地中”有关。而正如何弩所论证的那样，ⅡM22漆杆圭尺的发现和研究，一下子将“中国”概念形成的历史提早到了4000多年以前的陶寺时代。

根据陶寺遗址考古发表的报告，陶寺文化分为早、中、晚三期，在中、晚期之

^① 何弩：《陶寺中期小城内大型建筑ⅡFJT1发掘心路历程杂谈》，《新世纪的中国考古学——王仲殊先生八十华诞纪念文集》，科学出版社，2005年，221～223页。

际，确实发现有中期居址、城址、墓葬有遭陶寺文化晚期人捣毁破坏的情况。何弩据此提出“政治报复”的概念，并“推测陶寺中期政权很有可能被外来的武装势力所推翻，并遭到了政治报复”。联系到陶寺晚期人牙锶同位素分析结果，外来人口的比重竟占到了76.9%，对羊骨的鉴定结果证明在陶寺晚期来自西北地区的绵羊养殖业有迅猛增加，合乎逻辑地“将摧毁陶寺城址的征服者指向石峁城址”。我不否认这种大规模暴力行为的存在，也不否认这有可能反映了陶寺政权发生过更迭的推测，但陶寺文化从早期到晚期在考古文化面貌上却看不出有什么突然的变化，这牵涉到考古学文化与族的共同体能否对应、如何对应以及陶寺文化早、中、晚期的族系是否发生过重大改变的理论问题，恐怕还需要继续深入研究。

关于宗教观考古，何弩认为“宗教观是人们对自然存在和社会存在的超自然的（神的）认知、解释和信仰与崇拜，包括宗教信仰体系和宗教权力分配观念两大部分”。在该书第267页图一九五“宗教观结构图示”中，在宗教信仰体系中，列有神祇、巫覡、物用、法术和宗教仪式；在宗教权力分配观念中，列有教义制定权、教义解释权和主祭权。

“宗教信仰体系是宗教观最基本的内容”，而宗教仪式及其物用的探讨则是宗教信仰体系考古的核心。何弩在讨论如何开展这方面工作时，援引了伦福儒、巴恩在《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一书中提出的包含环境、场所、建筑、礼器、法器、祭品、牺牲、舞蹈、膜拜、相关物品处理方式等4个方面16条内容的“礼仪的考古标志物”概念，他自己又提出补充了5条共21条内容，他说“经过上述补充，我们认为判断宗教礼仪的考古标志就更加全面，更加本土化”。在分析时，“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考古资料，尽量从各个角度来综合分析论证，尤其要注意遗物与遗物、遗物与遗迹、遗迹与遗迹之间的考古存在背景关系”。并以红山文化的牛河梁、东山嘴两遗址为例，通过具体分析其包含的“礼仪考古标志物”，探讨了遗址作为大型祭祀场所的性质。

“所谓宗教权力总体上说是与神沟通的权力”，宗教权力分配观念研究，是要从微观聚落形态、随葬品、象征符号垄断状况这三个方面来考察，是哪个阶层的人控制着宗教教义的制定、对教义的解释和主祭权，控制的程度又如何。

在此理念指引下，何弩将肖家屋脊文化罗家柏岭遗址和自己实际参与考古的陶寺文化陶寺遗址作为两个个案探讨了其宗教信仰状况。

罗家柏岭是石家河城址南墙壕沟外一片红烧土遗址，过去的发掘报告认为是玉器制造遗址。何弩援引众多古代典籍有关记载，对遗址所处的位置、形状以及其上发现的长直墙与长沟、烧土房基、烧土坛面、坛面上的燔柴遗迹与遗物一一进行考证，认为应是“郊天祭日的圜丘，与上天或祭天的有关的小祭祀，如杀牲前灌祭告幽、大祭后报先炊老妇、爇祀焚巫尪求雨、射天狼救日食、击鼓救日等也在此举行”。肖家屋

脊文化包括罗家柏岭遗址在内，也出土有牙璋、璧戚、管、环、柄形器、玉人、玉动物等玉器，也对照文献中提到的玉器名称进行了命名，考证了其功用和象征意义。其中他所分的A型无露齿平顶冠玉人头像是颡顼、B型露齿玉人头像是蚩尤、玉蝉为祝融、玉勾龙为后土、玉凤环为阳鸟以及玉鹰、羊、鹿、兽面等为巫覡通天的蹠等推测，颇为新鲜，但要证实，却也困难。不过，这些玉器大部分是礼器和与宗教信仰有关的遗物，则是可以肯定的。

陶寺文化中与宗教信仰有关的遗迹，前已提及的有观象台址、漆绘圭尺，遗物中的彩绘龙盘、彩绘日云纹组合及红云羽毛纹组合低温陶罐、彩绘太阳纹大口罐、三角形陶板和一些玉器等。彩绘龙盘仅出于早期王墓，低温陶，没有实用价值，何弩推测其上所绘动物应为身形似蛇的黑鱼，鱼头顶和头下的“垂耳”可能是角，口中所衔的草可能是起致幻作用的麻黄草，这种器物肯定与祭祀先祖有关。何弩对三角形陶板的考释也颇有新意，这种三角形陶板发现时成圈状摆放，外缘较厚，尖端较薄，可拼成一个圆形，将其复原水平摆放并向上叠码，恰似“且”的造型。他结合云南丽江摩梭人村寨祖庙广场上矗立的石砌祖先塔形状，推断这种三角形陶板很可能就是建造祖先崇拜物的组件。我去陶寺参观时没有注意这些东西，何弩的分析是有道理的，至少对研究其性质和用途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关于符号系统考古。符号系统（含文字）“是有关自然观、社会观、宗教观以及艺术的符号和文字表达”。该书图二七五是何弩制作的“符号系统结构图示”，它包括实物立体符号、标记符号、象征符号、含图画符号与线条符号的句意符号和文字五个系统。所谓符号系统考古，就是对上述五个子系统的考古研究。一般所说的图像考古，实际上也属于符号系统考古的范畴。

实物立体符号出现甚早，“多与古人的记事与帮助记忆有关，是我们符号考古不能舍弃的、必须提高重视的部分”。何弩指出像西亚考古中常见的陶封球、陶筹一类遗物，在我国许多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也不乏出土，安徽潜山薛家岗出土的小陶球、陶棒，蚌埠双墩遗址出土的“投掷器”、“尖状器”，陕西西安杨官寨遗址出土的小陶罐、小石球等，都可能是和西亚出土的陶封球、陶筹一样，具有同样的功能，只是未引起中国学者的注意。

标记符号在仰韶文化、大溪文化、双墩文化等新石器时代文化中常见，历来受到重视，研究者也不乏其人。但何弩认为，将其放在考古存在背景关系中进行研究应是正确的方向，一味与汉字起源挂钩，限制了研究者思考的范围，可能是个误区。他以双墩遗址出土较多的外底部有刻符的陶碗为例，先推测其可能具有像秦汉漆器外底刻的“画押款”一样的标志功能，后又受古希腊雅典发现的用于投票决定放逐对象的“陶片选票”的启发，大胆推测这些刻符陶碗也可能充作无记名投票选举时的“票箱”使用。当然这是一种无法证明的推测，但我觉得有推测有想法，总比不管不问好。

“标记符号没有固定的意思”，象征符号则“是与它所象征的事物存在一定约定联系的符号”。何弩认为：象征符号“有重复几率较高的考古存在背景关系、有比较固定的符号形态、有比较固定的含义、有比较固定的功能”等一系列鲜明的特征，“比如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的陶尊上的刻划符号”即如此。他说象征符号的“构形法则以象形为主，在多数案例中古人和今人都可以大致懂得其所象为何物，在比较固定的使用环境中（考古存在背景关系中），在一定的范围内（通常是本考古学文化内），具有比较固定的、众人皆知的约定含义”。并以山东莒县大朱家村大汶口文化陶尊上的“旦”符为例，通过实地考察观测，认同莒县博物馆馆长苏兆庆最先提出的此乃“大朱家村遗址东部屋楼岗山春分日出观天象的描绘”的意见。认为“多数象征符号多与宗教有关，是通神的媒介，通常也是单独使用，不必用语言表达，或其本身不能与固定的发音对应，它所表达的是一位神、一段神话、一句祈祷或咒语等，脱离了特定的使用环境或存在背景关系，它可能就丧失了原来的意义甚至什么也不是”。我同意何弩的分析。

句意符号包括图画句意符号和线条句意符号两类，何弩对句意符号给出的定义是：“句意符号是一组简化的图画（好像连环画）或由图画简化和抽象出来的象形符号，独立表达（不是插图）某个完整的、在图形上没有分解为单个词的信息，只是重现信息的内容，不反映语言的形式。”句意符号也“不是文字，没有固定的词语来表述，却能独立完整地传达语言所要表达的核心思想”。其中句意图画符号他举出的有图二九五余杭南湖出土陶罐上的良渚文化刻符，句意线条符号他举出的是图二九七山东邹平丁公出土陶片上的山东龙山文化刻符。对句意符号的研究，他提出“可以通过当时解释者解释其具体含义，也可以通过今天受众思维转换而被受众所接收，即在考古存在背景关系中、在考古学文化的背景下，结合民族志资料，进行句意图画符号内容的探索”。句意线条符号“因其抽象性，探索的难度远大于句意图画符号，目前尚无成熟的研究范式。从技术路线的角度看，句意线条符号的探索，首先要澄清这些抽象的线条符号原本象形的本源是该考古学文化中存在的哪种现实事物，复原或翻译成句意图画符号的版本，再按照句意图画符号研究的方法进行分析”。这当然是很好的研究思路，但迄今还不知道有谁遵循这一研究路线，破解了南湖出土陶罐和丁公出土陶片上的良渚文化、山东龙山文化句意线条符号。

文字也是符号，有关汉字起源的研究，恐怕是符号系统中最为热门的话题。何弩认为“汉字起源的考古探索，不仅要在明确文字定义和特质的理论基础上，从考古学角度判别文字符号，还要研究汉字起源的动力和过程”。他说汉字是表意文字，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所谓的“六书”是汉字构形的原则，掌握了“六书”的精髓就掌握了判别式。他依此为突破口以陶寺出土“文”、“尧”朱书符号为例，详细地阐述了自己考证的过程，认为这两个符号确为“文”、“尧”二字，由此证明

“陶寺文化已经产生文字了”。至于汉字产生的动力与过程，他也用较多的文字作了说明。何弩并非古文字学家，但他对文字的认识、特别是对陶寺出土“文”、“尧”二字的研究是颇有说服力的。

符号系统是精神文化考古中最为复杂的系统之一，何弩在阐明符号系统理论诸问题之后，制定了该书图三〇〇的“符号系统发展关系图”，十分明白地告诉大家符号系统各子系统之间的逻辑关系。

何弩曾长期在湖北荆州博物馆从事考古工作，对石家河文化、肖家屋脊文化都很熟悉。在他梳理完善的符号系统考古理论指引下，他以整整一节的篇幅对石家河文化陶符做了研究。根据他的研究，这类陶符多为神徽，集中出土于肖家屋脊F12、F13、F15所谓家庙区及其附近。在邓家湾的出土情形，与肖家屋脊类似。他对这些陶符神徽的含义作了分析，分为以角形符、帝形符、高柄杯符、介形符等为代表的人神类，以凸形符、灶形符为代表的人造物类，以斜腹杯符、鬲形符、宫室符等为代表的土地神类和镰刀符、阳鸟符等其他自然神类四大类，共22种。其中14种能破解其确切或较明确的含义，涉及11种神祇，不明其确切含义者有7种，“石家河文化陶符神徽所沟通的神祇总计18位”。

研读何弩对石家河陶符的研究，可以看出其思路和方法：一是看其存在背景关系，二是辨其所象何物（属于何种符号系统），三是从古籍记载和别人的研究成果中寻找参考，这就使其研究放到了科学的轨道上，而与毫无根据的无端猜想划清了界限。这样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应该是可行的。不过，这些陶符存在的时间距今已经有4000年左右的时间，许多软性的证据已经消失，要从现在看到的遗留下来的一鳞半爪来恢复当时的情景，困难极大，如果能做到有部分接近真实就是很高的褒奖了。

关于艺术考古，何弩基于艺术是“用幻象形式显现原型的部分特征以表达人类认知世界的图示和艺术家与受众的情感”的认识，将艺术考古的定义表达为：“用考古综合研究方法分析古代艺术物质遗存资料（艺术品遗存），以探索古代艺术的发生、特性与社会功能。”而“所谓艺术考古的考古综合研究方法，不是指考古地层学、类型学以确定古代艺术物质遗存的相对年代，……艺术考古的基本工作是在考古已经确定了古代艺术物质遗存年代的基础上，将古代艺术物质遗存放回到考古存在背景关系中，运用艺术类型学、艺术学、艺术心理学、民族志考古、实验考古、人类学或民族志参考、古代文献甚至必要的科技考古检测等综合分析方法，探索古代艺术的发生、特性与社会功能”。

艺术考古是精神文化考古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和前述符号系统一样，也是精神文化考古理论结构中自然观、社会观、宗教观三个核心观的表达系统之一。尽管原始艺术与宗教观及符号系统有不少交集，有的甚至难以区分，但艺术考古的重点、目的、方法还是与之有所不同。如何开展艺术考古研究，何弩在该书的最后一章“艺术考古

研究理论与方法”的第六节以“石家河文化彩陶纺轮太极图艺术分析”为例，从素面纺轮、一点纹纺轮到太极图纹纺轮，探讨了纺轮创作者的艺术心理变化及纺轮图纹的象征意义。并引用著名艺术心理学家贡布里希的如是赞誉：“历史上的‘动态对称’的大师应属于中国和日本的图案设计师。他们设计了著名的和谐的象征符号——阴阳太极图，在这一协调的符号中，不对称的两半在一个宁静的圆中组成了一幅完美无缺的图案。”何弩说：“太极图彩陶‘纺轮’的例子说明，动态对称的动态平衡秩序所造就的美感，使‘天地形成、动态和谐’的宇宙观理论更加生动形象而深入人心，最终的目的是使‘阴阳太极图’的象征意义，让更多的人易于接受。”

如果以上这些可以看作是我在阅读这部书的过程中断断续续写出的读书笔记，那么整合起来总体上是什么样的评价呢？

第一，这是在对国内外相关考古学理论和前人研究成果作了认真研究分析吸收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实践和研究写出来的一部系统的原创性的精神文化考古理论方法著作，它的出版必将推动中国精神领域考古的开展，改变以往在此领域不够活跃的状况；

第二，提出了一条科学的、切实可行的把研究对象放在特定的考古存在背景关系中，借鉴和吸收文化人类学、民族学、艺术学等相关学科研究方法，从我国浩如烟海的古籍中汲取灵感，和考古实践密切结合的研究思路；

第三，强调理论的实践性，运用精神文化考古理论方法对考古发现的相关遗存开展研究，提出了诸如陶寺观象台遗址性质、漆杆圭尺功用等一系列有创见和说服力的解释，开阔了人们的眼界；

第四，对自己提出来的一些理论、概念的界说和阐释，需在实际运用中不断总结提炼，精益求精，使其成为考古工作者人人耳熟能详的标尺；

第五，古籍记载是重要资源，应予珍惜。书中大量引用古籍记载证成己说，方向无可非议，但如何使用、使用到什么程度，要进行可信性研究，这方面应予加强。

精神文化考古是一个广阔无垠的领域，许多问题等待我们去研究、去回答。何弩一定会矢志不移，继续前行，在已经取得的成果基础上去创造更多奇迹。

是为序。

李伯谦

2014年8月4日

前 言

人作为与普通动物最大的区别在于人有缜密的符号化思想。人类又是社会性动物，一群人的思想活动必然会形成精神文化。在没有文字记载的史前时期，人们的精神文化就已经存在，自然成为我们今人考古探索古人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不过，这个认识是逐步觉醒的，在多年来的跌跌撞撞中渐渐清晰起来。

我自1981年考进北京大学考古专业（1983年改为考古系）学习，接触考古学。此前，曾以一个中学生对于考古的认知，认为考古主要工夫在于古墓、佛塔、古建、园林文化精神的探究上。学了考古之后，我中规中矩地痴迷于多记一个考古学文化，得意于多分出一个考古学文化，满足于分辨出复杂的地层单位，欣喜于新发现一种器物，反将中学时代对考古学最初的朦胧认识忘到爪哇国去了。

1985年师从恩师李伯谦先生读硕士研究生，老师任我天马行空自由畅想，使我重新拾回了中学时代对于考古学的朦胧认识——考古学能探知古人想啥吗？

我是新中国培养的花朵，没有宗教信仰，却对史前宗教着迷，有些类似当代孩子对杰克罗琳创造的“哈利波特魔法世界”的痴迷。也正是对史前宗教的好奇，才开启了我精神文化考古领域摸索的大门。史前宗教成为我摸索“古人是怎样想”的第一扇门。我当时阅读和购买了有关史前宗教、原始思维、图腾崇拜、神话、原始巫术、宗教人类学、民族志宗教资料等书籍，如丁山的《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①，胡朴安的《中华全国风俗志》^②，列维-布留尔的《原始思维》^③，列维-斯特劳斯的《野性的思维》^④，马林诺夫斯基的《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⑤，弗雷泽的《金枝》^⑥，格罗塞的《艺术的起源》^⑦，B. A. 伊斯特林的《文字的产生和发展》^⑧，袁珂、周明的《中国

① 丁山：《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影印版。

② 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影印版。

③ 列维-布留尔著，丁由译：《原始思维》，商务印书馆，1987年。

④ 列维-斯特劳斯著，李幼蒸译：《野性的思维》，商务印书馆，1987年。

⑤ 马林诺夫斯基著，李安宅译：《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影印本。

⑥ J.G.弗雷泽著，徐育新等译：《金枝》，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

⑦ 格罗塞著，蔡慕晖译：《艺术的起源》，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2版。

⑧ B.A.伊斯特林著，左少兴译，王荣宅校：《文字的产生和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

神话资料萃编》^①，力强的《太阳系与希腊神话》^②，陶立璠和李耀宗的《中国少数民族神话传说选》^③，弗洛伊德的《图腾与禁忌》^④，岑家梧的《图腾艺术史》和李则纲的《始祖的诞生与图腾》^⑤等。

我一边学着思考，一边学着写论文，1987年完成了《略谈原始宗教中的转生媒介》的初稿，于1989年12月17日在《中国文物报》第3版上发表，这是我正式发表的第二篇学术论文。

1988年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湖北荆州博物馆考古部工作，神秘的肖家屋脊文化玉器的精神世界和东周楚文化奇诡浪漫的诗一般的精神底蕴彻底征服了我的内心世界，我认定，考古学不仅要探知古人的物质世界，更要探知古人异彩纷呈、绚烂多姿的精神世界。

在探索长江中游史前时期城址功能与社会组织复杂化的过程中，我惊叹于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人们建立堰居式与城居式结合的水控制体系的聪明才智，开始意识到古人的思想智慧绝不仅限于宗教信仰，还有许多对自然与社会的具有很高水准的认识，这大约就是所谓的“认知”吧。

1995~1996年，我得到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的资助，到美国旧金山州立大学人类学系做了10个月的访问学者，与Gary Pahl教授合作研究石家河文化刻划符号。这是我考古生涯中最为重要的一步，我真正接触到了一直心仪的美国考古学理论，知道了伦福儒和福兰纳利的“认知考古”理论。当时我欣喜若狂，认为找到了考古探索精神领域的制胜法宝，奉为圭臬，并积极鼓吹。在与Pahl教授的合作中，对符号系统和文字的考古探索也有了自己的心得。

1999年我考回北京大学继续师从李伯谦老师攻读博士学位。在2001年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长江中游文明进程》里，就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肖家屋脊文化，分别各做一章，论述各阶段的“认知世界”，内容涉及原始宗教、宇宙观、符号系统、等级观念、宗法观念、礼制观念等，开始了在精神文化各分支领域里的探触，从盲人摸象进入一个全面摸索的新阶段，精神文化考古内涵由福兰纳利的“宇宙观、宗教、意识形态、符号系统”的理论概念，一一落到了考古研究的实在当中，对精神文化考古研究的内涵开始有了一个稍微完整轮廓的绰约认识。

① 袁珂、周明：《中国神话资料萃编》，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

② 力强：《太阳系与希腊神话》，科学普及出版社，1985年。

③ 陶立璠、李耀宗：《中国少数民族神话传说选》，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

④ 弗洛伊德著，杨庸一译：《图腾与禁忌》，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翻印“志文出版社本”。

⑤ 岑家梧：《图腾艺术史》，学林出版社，1986年；李则纲：《始祖的诞生与图腾》，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影印本。